

主 编 钟启泉 曾德盛

副主编 胡彩芬 杨丽娜

广西人民出版社

改革开放 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回 顾

(桂)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董苏煌 陈 红

责任校对 覃 俭

改革开放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回顾

主 编 钟启泉 曾德盛

副主编 胡彩芬 杨丽娜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 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3.5 印张 333 千字

南宁社科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219-03895-x/D·522

定价: 20.00 元

谨 以 此 书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
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詹宏松

副主任：黄 铮 何 新

委 员：钟启泉 许家康 李秋洪

周昌盛 曾德盛 肖永孜

寿思华 李 疆 胡彩芬

杨丽娜

为推进跨世纪伟业提供理论支持

——写在《改革开放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回顾》一书出版之际（代序）

詹宏松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20年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在中华大地波澜壮阔地展开，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根本原因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

理论是对客观现实的理性反映，更具有高度抽象概括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以及科学的预见性和实践的指导性的本质特征。伟大的革命斗争和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理论，它反过来又指导伟大的实践，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实践，使我们党产生了又一次理论上的巨大飞跃，产生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而不是别的理论作指导，才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今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区社科院科研人员编写了《改革开放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回顾》一书，对改革开放以来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回顾。全书概括了从“思想解放”到“新时期党的建设”等20个重大理论问题，颇具特色，值得一读。该书主要特色是：①全书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邓小平理论是贯穿全书的

主线。20 个问题，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重要内容的深入论述。通过学习可以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②动态中回顾改革开放 20 年的重大理论问题。该书不是孤立、静止地看问题，而是以发展的视角来观察分析问题，读后给人以启迪和前瞻，有所收益。③力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解释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问题。例如，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等都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该书都作了较深入的阐述，试图给读者以解惑。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具有理论思维则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在纪念改革开放 20 周年的今天，在跨越世纪的征途上，我们更需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只有它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取得更大胜利。从事社科理论研究的广大理论工作者，必须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继续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潜心研究，多出理论精品，为推进跨世纪伟业提供理论支持。

目 录

为推进跨世纪伟业提供理论支持（代序）	（1）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1）
社会主义本质	（2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46）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7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85）
社会主义所有制	（101）
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124）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151）
关于农村改革	（172）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	（202）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224）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246）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263）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283）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99）
附一、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314）
附二、关于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 艰苦创业精神	（327）
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才是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	（341）
关于可持续发展	（351）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368）
“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	（384）
新时期党的建设	（404）
后记	（425）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从改革开放的启动，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步深入和发展，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和党中央在关键时刻作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革命胆略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思想路线。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活的灵魂。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为什么还需要重新确立呢？这是因为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搞得不好，是会反复的。毛泽东晚年恰恰是违背了自己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导致了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的错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①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开创改革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要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克服了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党开创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党继续遵循在延安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取得了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

但是，在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由于毛泽东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这一错误虽然在后来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但是，总的来说“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同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随着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越来越严重地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的错误。

发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失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思想根源来说，就是背离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违背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正本清源，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思想理论方面的首要任务。

2.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正像我们党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思想理论斗争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刚开始的拨乱反正,就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两个凡是”的障碍,主要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继续坚持“左”的错误造成的。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党内外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强烈要求,华国锋却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错就错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打倒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党的路线没有问题。所以,他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为口号,赞成揭批林彪、“四人帮”,但反对纠正“左”的错误,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口号和理论,阻碍平反冤假错案。这不仅是政治路线的分歧,而且是思想路线的分歧。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当时中宣部的汇报后提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判。在这里华国锋实际上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一份讲稿中又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纠正,不能容忍。”根据上述思想,2月7日,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不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人们就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正确

思想路线就不能恢复。

为了冲破禁锢，打开局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就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下，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1977年5月24日，中央两位同志在看望邓小平时，邓小平作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谈话。他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认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这些深刻的论述，有力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1977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他说：“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他并且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这不仅划清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与“两个凡是”的界限，而且提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问题。

与此同时，叶剑英、陈云、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别发表文章，论述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作风，正面批判“两个凡是”的

错误。1977年第9期《红旗》杂志发表了聂荣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文章指出:“《实践论》的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是第一性的,实际生活、现实事物,是第一性的。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到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经验来检验。”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他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红旗》杂志1977年第12期发表了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谈了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他强调:“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践,不受实践检验,那算什么理论!”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坚决抵制和批判,全党全国的思想大解放不可避免地要来了。

3.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全国的思想解放

面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一些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促进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份刊物是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倡办的,文章也由他审定。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当天新华社将此稿向全国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许多地方报纸同时转载。

这篇文章的初稿执笔者是胡福明,孙长江最后执笔完稿,《光明日报》和中共中央党校的有关同志主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做了多次重大的修改,并在胡耀邦支持和审查同意下发表,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篇文章主题鲜明,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是真理本身,而只能是实践,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路线、政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文

章特别强调：“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含蓄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从思想路线和基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全党和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的欢迎。

由于文章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马上采取了激烈的反对态度。就在《人民日报》转载该文的当天晚上，当时中共中央毛著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领导人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采取压制的态度，他指示中宣部的某些领导人，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介入”。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连续发表谈话指责这篇文章。他指责《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是“党性不强”，要“接受教训，下不为例”。他并且认为：这篇文章问题很大，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他责令《红旗》杂志不要表态，授意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宣传部负责人也不要表态和介入，并批评已表态支持讨论的同志，企图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这个关键时候，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公开表明态度，予以支持。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那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①邓小平正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的锐利眼光和坚定立场，在“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中，坚定地支持后者。1978年5月，军委总政治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起草文件时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页。

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邓小平听取汇报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反映了“两个凡是”的思潮，并表示“我一定要讲话”。6月2日，邓小平发表了《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他尖锐地指出：“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这场大讨论。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撰写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新华社全文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6月24日，在时任中央军委罗瑞卿的支持和指导下，《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吴江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也同时转载。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消息。一个省委通过新闻媒体公开表态，参与、支持这个讨论，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入一个新阶段。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谈话。他说：“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并且指出：“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邓小平这一讲话深刻地指明了这场大讨论的实质。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支持下，从1978年6月至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发表文章或讲话，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理论工作者也写了大量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有650多篇。一个理论问题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促进了全党和全国的思想大解放，在思想理论上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准备。

4.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程为：一、讨论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学习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倡议下，会议改变了原定议题。会议就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陈云在发言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因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到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就这些问题，以及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和他两年来领导工作中的失误问题，恢复党的优良传统问题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12月13日，在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

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民主。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指出,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需要强调民主。邓小平的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围绕这个中心,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的历史贡献。全会坚决冲破了党的领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全会完全同意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总的指导方针,认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才能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变,才能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总结多年来党的历史经验,总结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这就为党全面地进行拨乱反正,为集中力量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1.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①

首先，实事求是包含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首先要承认客观存在的事物，一切从实际出发，因而它是以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正是实事求是中“唯实”所体现的唯物主义前提。

其次，实事求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实事求是的出发点是“实事”，落脚点是“求是”，即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这就坚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同时，尊重实际同尊重实践是一致的，强调从“实事”中求得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也就坚持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发展动力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客观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实事求是同时又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另外，“求是”即探索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